

观点扫描



技术可以外包,权威不能让渡。社会力量可以参与,但边界划在提供技术支持、技术服务上,不能越俎代庖、自行其是。

地震预警,准确是生命线

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:8月24日8时26分,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4.7级地震。此次地震后,许多网友反映,他们的手机上收到了震级为7.7级的预警,引起了一定担忧。

四川省地震局通报,这是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冒用“中国地震预警网”名义,通过荣耀、维沃手机以及小天才手表等渠道向社会公众发布的预警信息。

4.7级报成7.7级,差之毫厘,谬以千里。这是地震震级,两者的区别已经不是一句“误差”可以解释的。

预警信息的生命线在快更在准,二者缺一不可。通过技术进步可以不断逼近快的极限,但准取决于技术,更取决于发布主体的权威性和审核机制的严密性。如果为了抢那几秒钟而牺牲准确性,预警就从“救命信号”变成“恐慌制造机”。

“防震减灾法”明文规定,国家对地震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。有人提出质疑,认为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作为一家社会研究机构,没有权力发布这样的信息。其实,地震预警不等于地震预报。地震预报是指对尚未发生但是有可能发生的地震事先发出预告。而

地震预警是指地震发生后,利用地震预警系统,在破坏性地震波到达之前向可能遭受破坏的区域发出警报。

《四川省地震预警管理办法》规定,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依法开展地震预警科技创新、产品研发和成果应用,参与地震预警系统建设。也就是说,社会力量可以参与,但边界划在提供技术支持、技术服务上,不能越俎代庖、自行其是。社会需要一个清晰、唯一、可信的信号,用以指导快速调度与响应。如今,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在已经被取消第三方授权的情况下,擅自发布地震预警信息,这显然已经越权了。更何况,该所发布的震级严重错误,更是违背了准确性的原则。

为了防止类似的事再次发生,当务之急是建立统一的发布机制,明确权责、厘清边界。民间技术企业可以提供算法、提供设备、提供算力,但不能越过“发布者”这条红线。社会力量应该严格遵守相关法律的规定。

技术可以外包,权威不能让渡。将社会力量导向技术创新和服务提升,将发布权牢牢掌握在法定机构手中,才能真正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线。

高路 来源:钱江晚报



食品安全的底线,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,消杀行业必须规范透明起来,把藏在暗处的风险彻底清出去。

用敌敌畏给饭店消杀,需全链条溯责

近日,新京报我们视频调查发现,一家为绿茶、先启半步颠、池奈、凤缘家港式茶点、鱼旨寿司等十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服务的公司,长期使用敌敌畏进行消杀。为规避检查,员工将敌敌畏原液灌入矿泉水瓶并撕掉标签,还使用“三无”杀鼠剂。另据最新报道,涉事企业在辖区的经营场所已关停。涉事消杀公司未取得消杀资质。目前,厦门市多部门已介入调查。

报道中的一些细节,让人不忍卒视,含有敌敌畏的农药被不管不顾地喷洒,任凭药剂落在餐具、桌椅等处,部分厨具附近甚至还摆放着食材;已经有十几家店出现“海鲜被(敌敌畏)打死的情况”;敌敌畏有七天的挥发期,但在完成消杀的次日,所有餐饮门店均正常营业……这些细节拼凑起来的,是一个巨大的食品安全隐患。

消杀公司存在的意义,是用专业手段保障餐饮环境的卫生安全,让消费者吃得放心。然而,当一家存在种种违法违规行,毫无专业性可言的消杀公司,在市场却如鱼得水,甚至监管都“管不着”时,人们有理由怀疑,整个行业生态究竟混乱到了什么程度,这也值得引起各方反思。

对监管部门而言,涉事消杀公司撕掉敌敌畏标签,或将其装入矿泉水瓶的做法,并没有多少技术门槛和隐蔽性,操作人员有无资格证也不是多难查的事,日常的监管检查对此不应存在盲区。

涉事消杀公司用敌敌畏代替正规消杀药品,无非就是因为成本低,如果餐厅只是图便宜,看重报价,却疏于对消杀公司资质、药品、现场操作的全流程把关,就等于把食品安全的关键一环,完全交到了不受约束的第三方手里。

面对这样的乱象,监管部门必须祭出严厉查处手段。不仅要对涉事企业依法严惩,让那些只知埋头赚黑心钱的人付出代价,还需以此为契机,查漏补缺,补齐制度短板。

不少餐饮经营者总觉得“消杀就是走个过场”,只要能拿到合规记录应付检查就行,却忘了自己才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。对此,必须压实商家责任,把好入场关。

食品安全的底线,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,消杀行业必须规范透明起来,把藏在暗处的风险彻底清出去。

迟道华 来源:新京报



从小跟孩子谈钱,谈的不只是钱,更是对财富的管理、对未来的规划和对家庭的责任。这对于帮助他们建立理性、健康的财富观至关重要。

我们该什么时候跟孩子谈钱

高校开学临近,一则“爸爸要拿女儿压岁钱抵生活费遭拒”的话题冲上热搜:杭州的王先生称,女儿要去西安读大学,原本打算每月给2500元生活费。因女儿手里有近10万元压岁钱,他便商量每月自己出1500元,另外1000元从孩子压岁钱里支取,遭到女儿当场拒绝。王先生的吐槽让压岁钱归属问题再掀热议。压岁钱到底归谁?法律层面早有定论:压岁钱属于长辈对孩子的赠与,所有权归孩子;父母作为监护人可以代为保管,不得挪用。换句话说,父母是“保管人”,不是“所有人”。女儿完全有权拒绝将自己的钱用于日常开销。王先生想用女儿的压岁钱支付部分大学生活费,在法律上讲不通,在情理上自然也会碰壁。

很多父母心里不服,压岁钱明明是“人情往来”的产物,孩子收了红包,父母也要对等回礼。这笔钱,天然带有“家庭共有”的色彩。这个朴素的想法虽然法律不支持,但并不等于父母完全没道理。

两代人的分歧,表面上是“这钱归谁”,深层次则是家庭资源该如何共同规划。而如何跟孩子谈钱,这恰恰是中国家庭最缺的一课。

王先生的问题,不在于有“想动压岁钱”的念头,而

在于时机和方式不对。他是在开学前夕才抛出“生活费你出1000元”的方案,而在女儿的认知里,这笔钱也许早就已列入了其他安排,比如学车、旅游等。女儿的拒绝并非抠门计较,而是既有预期被突然打破的本能防御反应。试想一下,如果早在高中阶段,甚至在大学录取通知书到来之前,父母就能和孩子坦诚交流:大学四年总花费是多少、家庭收入能覆盖多少、孩子是否需要分担一部分,那么结果很可能截然不同。孩子会觉得被尊重、被信任,而不是自己的钱被父母“惦记”上了。

遗憾的是,绝大多数中国家庭都没有这样的“谈钱时刻”。不少父母觉得“孩子太小,谈钱没用”;还有人觉得“一家人谈钱伤感情”。但事实恰恰相反:不谈钱,才会在关键时刻伤感情。尤其是现在的孩子,每年收到的压岁钱不少,学会如何好好花钱非常重要,家庭教育早就该补上财商这门课了。要知道,从小跟孩子谈钱,谈的不只是钱,更是对财富的管理、对未来的规划和对家庭的责任。这对于帮助他们建立理性、健康的财富观至关重要。

谭敏 来源:广州日报